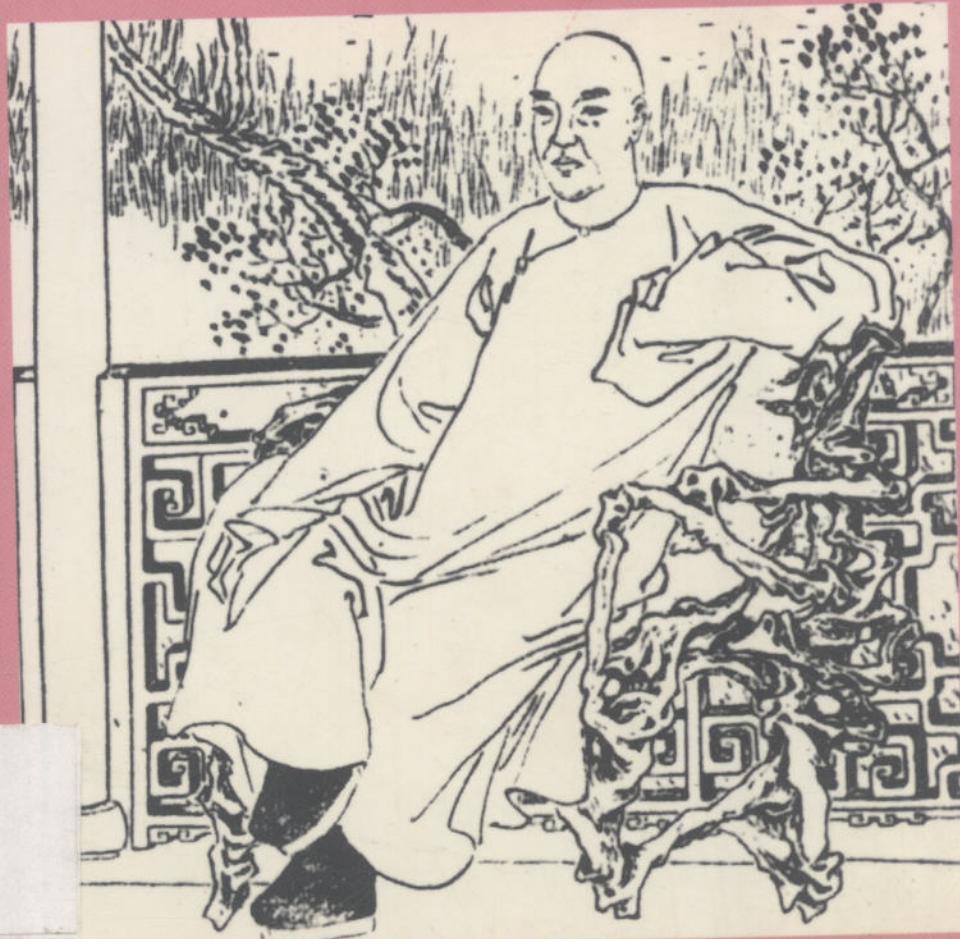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世情讽喻类

李绿园与歧路灯

杜贵晨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六辑

李绿园与歧路灯

杜贵晨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绿园与歧路灯/杜贵晨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
2000.12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6辑,世情讽喻类)

ISBN 7-5382-1706-1

I. 李… II. 杜… III. ①李绿园-文学研究 ②歧
灯-文学评论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69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64 千字 印张: 4
印数: 12,758—15,757 册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顺德
装帧设计: 安今生

责任校对: 马慧

定价: 4.50 元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优秀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 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 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

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一 血腥盛世.....	1
——李绿园的时代	
二 百年兴家.....	9
——李绿园的家世与生平	
三 文章有价	22
——李绿园的诗文和《歧路灯》的创作	
四 灯火阑珊	34
——《歧路灯》的故事和主题	
五 教育小说	43
——《歧路灯》对封建教育和知识界状况的描 写	
六 发愤之作	53
——《歧路灯》对封建末世的暴露	
七 市井春秋	68
——《歧路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	
八 人物画廊	82
——《歧路灯》的写人艺术	
九 叙事佳构	99

	——《歧路灯》的叙事艺术	
十 雅俗共赏.....	108	
	——《歧路灯》的语言艺术	
十一 重放光芒.....	115	
	——《歧路灯》的流传和版本	

一 血腥盛世

——李绿园的时代

李绿园生活于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他长寿的一生几乎与 18 世纪共始终。

清朝是在中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统一的极权统治的，“扬州十日”^①、“嘉定三屠”^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③等疯狂的杀戮，写下了历代封建王朝开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的“康乾盛世”则继续了这一“脍炙人口的虐政”（鲁迅语）。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各种武装反清斗争的同时，尤其注重钳制舆论，镇压人民思想上的反抗。自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文人结社，以后屡次严申，雍正三年（1725）更定例究查；自

① 扬州十日：顺治二年（1645），清兵破扬州，于城中杀戮十日。

② 嘉定三屠：顺治二年（1645），清兵在嘉定（今属上海市）进行了三次大屠杀。

③ 清顺治元年颁“剃发令”，违者处死，当时因有此说。

顺治十四年（1657）“科场案”^①，十八年“哭庙案”^②、“奏销案”^③等以后，康、雍、乾三朝更迭兴大狱；尤以文字狱最为惨烈，如康熙二年（1663）“《明史》案”，除庄廷钺已死“焚其骨”外，杀七十余人，株连二百余人（一说七百家）。此外有沈天甫“逆诗”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西征随笔》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谢济世注《大学》之狱等。据不完全的记载，乾隆六年（1741）至五十三年（1788）的四十八年间，各种文字狱有六十三起，杀人焚书，几乎成了每年的常例，其酷虐更甚于康熙、雍正。此外，康雍乾三朝还多次特诏禁毁“淫词小说”。

与高压手段相辅的是麻痹、利诱、笼络、羁縻等怀柔措施。理学是宋儒掺和了佛教义理的新儒学，主张“明天理，去人欲”，非常合乎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需要，清初诸帝都提倡不遗余力。康熙亲召理学家入宫讲习，刊印《性理精义》、《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颁行全国。给理学家以高官厚禄，如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都是所谓“理学名臣”。清代又以功名富贵为诱饵，

① 科场案：这一年顺天、江南、河南三处科举考试皆有舞弊，事发兴大狱，处死主考官等甚众，株连治罪者颇多。

② 哭庙案：苏州文人金圣叹等以给顺治送丧为名，哭临文庙，揭告贪官，被清廷处死。

③ 奏销案：清廷以追欠钱粮为名惩治汉族士绅，褫革万余人，捕三千人。

以八股文为手段，使天下读书人白首窗下，消磨于“四书”、八股文之间。同时开捐纳、保举之途，康熙、乾隆时还特设博学鸿词科，以名缰利索，四面网罗。康、雍、乾三朝先后集大批学者编辑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还开局修撰《明史》。这些措施固然有利于典籍文化流传的一面，但清朝皇帝的本意却是为了加强统治，借以羁縻汉族文人名士，抽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例如乾隆间一面诏求遗书，一面发布禁书令，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的八年间就焚书二十四次，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

高压政策使“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柳诒征《中国文化史》）而怀柔的手段似收到更多的效果，对于入清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没有明遗民学者文人对清朝的仇恨，又觉得读了书，不能没个官做，至少要靠读书所得以养亲糊口，所以大都入了理学和八股文的魔道，久而不闻其臭。即使有识之士，也往往“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为之。”（袁枚《答袁惠廉孝廉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这两手政策的影响，从当时河南的几件事可以看出。乾隆二十二年（1757），夏邑附生段昌绪因收藏吴三桂檄文被杀，前江苏布政使彭家屏因藏明末野史赐自尽，引起河南藏书之家人人恐惧。河南古称

中州，自宋元以来为“理学名区”。清初著名理学家孙奇逢先后讲学新安、辉县，造就了一大批理学门生，康熙时的“理学名臣”汤斌及理学家魏一鳌、耿介等就都是他的学生。影响所及，清代河南讲习理学的风气，一直非常浓郁。乾隆年间还出了一位被称为“中原名儒”的刘青芝，他是李绿园早年师事的前辈友人。

然而清朝统治者能暂时压制各种反抗，却不能防止自身的腐朽和堕落，更不能永远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相反，“康乾盛世”表面成功却助长了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并掩盖了深刻的危机。雍正用阴谋夺得帝位，屠杀兄弟，诛戮大臣，猜忌刻薄，刚戾自恣，是有清第一个暴君；乾隆则好大喜功，征战杀伐的“武功”一定要“十全”，“南巡”一定要六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诏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以后相沿未改，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十八年间，全国人口由二千四百十七万骤至三万万零一百四十八万，增十二倍有奇，大大超过了缓慢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国库空虚，又挥霍无度；米价腾贵，官僚又乘机贪污盘剥。乾隆间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占田八千顷，家私估银十亿两。朝政败坏，以致“康熙元年以来，中外臣民愍不畏法”（《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版第二页），至乾隆中，“‘刁

民’……往往聚众抗违，逞凶滋事。……动辄汹涌，甚至殴官伤役”（同上第七页）。据载，这一时期较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四十六起，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四起，大多发生于乾隆年间（同上第四章），可见这一“盛世”是如何地从危机四伏向危机四起发展了。

不过，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康、雍、乾三朝还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社会矛盾在发生、积累乃至局部激化，却还没有大规模全面爆发，社会生产仍在缓慢发展中，农业、手工业、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城市工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全国的情况看，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武昌等已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城市工商业中雇佣劳动已相当普遍，例如“苏州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页）从《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的家乡河南的情况看，经济的发展虽落后于南方，首府开封又曾在明末受过水患，但至乾隆年间各郡商业行馆仍呈现“星罗棋布，次第秩然”（阿思哈《重修相国寺并建行馆小记》）的景象。开封以南四十里的朱仙镇为当时全国四大镇之一，南北往输，商业最为繁盛。雇佣劳动与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必然造成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并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自清

初顾炎武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抨击君主制，至乾隆中戴震直斥“后儒以理杀人”（《戴东原集·与某书》），提出“有人欲才有天理”，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孟子字义疏证》）的主张，标志了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尽管这一脉进步思想在当时影响不大，但与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相呼应，又值理学泛滥日久，弊端百出，故能动摇封建思想统治。康熙甚至发现理学家魏象枢、李光地等虚伪做作，当面斥责，普通有识之士就更可以对理学之弊表示不满和进行批评了。

康、雍、乾时期封建制度的危机还具体地表现为世家地主地位的动摇和败落。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由封建家庭的宗法制放大而来的，封建家庭历来是封建国家的基础和细胞。封建国家是一姓之产业，皇帝以“孝”治天下；封建家庭则化家为国，移孝作忠。上下一致的宗法制关系维持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统治的基础开始动摇解体，清代的状况尤为严重，突出表现为贵族和普通地主子弟的堕落。例如清朝建立不久的顺治末年，八旗子弟就已经不习武艺；康熙皇帝斥责太子允礽“举动不法祖德，不遵诲谕，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以尽言，……岂可托祖宗之宏业！”不禁为之“痛哭仆地”（《清鉴》康熙四十七年）；大臣徐乾

学的子弟在外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张鹏翮的子侄在外指名要钱，成了《水浒传》中所写的高衙内似的无赖。普通乡绅子弟也大都不事读书、生产，相率偷惰成风。李绿园写他几十年所见说：“近来浮浪子弟，添出几种怪异，如养鹰、供戏、斗鹌鹑、聚呼卢（即聚赌）等是。我生之初，不过见无赖之徒为之，今则俊丽后生，洁净书房，有此直为恒事。”（《家训谆言》、《歧路灯研究资料》，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不注书名）许多世家地主因此败落。例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爽，遇贫辄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而更多的则生活糜烂，连人品也堕落了。诚如《红楼梦》中贾母所慨叹的：“如今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了。”

“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康雍乾三朝“外似升平，内实蛊坏”的虐政统治，使一代文学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学者为了远祸，而寄情考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诗文作者多谀颂献媚，点缀升平，或为消遣应酬之作；小说戏剧则托古人古事，甚至要声明“无朝代可考”，“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红楼梦》第一回）或者托之花妖狐魅，“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王士

祯题《聊斋志异》的这两句诗曲折道出了当时小说家为文字狱所迫的悲剧，同时也说明了一旦作“人间语”（描写现实生活）就很难从主观上超出封建文网的规范。李绿园就是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歧路灯》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氛围里，其成就与局限都与封建社会这个血腥盛世密切相关。

二 百年兴家 ——李绿园的 家世与生平

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又号碧圃老人。祖籍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累世居住在县北北冶镇的马行沟村。

李绿园一世祖名李昂。昂生三子，长名守分；守分生三子，次名调元；调元生二子，长名玉琳，次名玉玠。玉琳是一个普通的秀才，弟兄耕读持家，稍丰裕，但一遇灾荒，便无力应付：

康熙辛未岁，大饥。玉琳兄弟方奉母就食四方，会洛阳会试，玉琳乃留试，遣弟玉玠负母赴南阳去矣。试竣，持七十钱星夜奔迹，抵南阳之梅林铺，音问渺然。值日将暮，计穷情急，乃坐道旁呼天大号曰：“我新安李某也，寻亲至此，已八百里，足茧囊竭，而

亲不可得，独有死耳！”益大号。突有仓皇来前者，即玉玠也。玉玠已为土著延作塾师，坐间，忽心动，若有迫之者曰：“起！起！汝兄至矣。”急出户，闻号声乃前，与玉琳相持泣归。……

这是清乾隆间中州著名文人刘青芝所写《宝丰文学李君墓表》中的记载，刘青芝还据此另作有《李孝子传》。这个故事在清代广为流传，被载入地方志。

这个“寻母李孝子”就是李绿园的祖父，名玉琳，字雍州，号鹿峰。康熙辛未（1691），李玉琳又从南阳流迁至鲁山县（今河南省鲁山县）的水牛屯，大约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①，移居临县宝丰的河岸李（村名）。也许因为是同姓又是孝子和读书人的缘故吧，河岸李李姓家族热情收留了这位外乡人，还推荐他到附近鱼山的义学里教书，后又在村东南三里宋家寨的李姓庄园中划出一区，赠给了他。从此，李玉琳遂在宋家寨安居下来，靠着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李玉琳教书治经，对《春秋》颇有研究，著有《春秋文汇》，不传；他也能作诗，但传世仅

^① 据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歧路灯论丛二》收载）引李绿园《重修关壮缪祠碑记》。